



CHUANTONG YU XIANDAI DE JIAOFENG

# 传统与现代的交锋

百年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表达

容中逵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 2008 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传统与现代研究”(课题批准号:CGA080210)成果之一

# 传统与现代的交锋

——百年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表达

容中達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与现代的交锋：百年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表达  
/ 容中逵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7-308-08094-1

I. ①传… II. ①容… III. ①乡村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 IV. ①G72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6078 号

## 传统与现代的交锋

——百年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表达

容中逵 著

---

责任编辑 李玲如

封面设计 魏 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094-1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导 论 解剖麻雀的意义 .....              | 1  |
| 一、为何要解剖麻雀? / 1                 |    |
| 二、如何解剖麻雀? / 10                 |    |
| 三、麻雀的五脏六腑如何? / 15              |    |
| 第一章 自然演进中的乡村家庭教养 .....         | 25 |
| 一、晚清时期:五服之内的家族教养 / 25          |    |
| 二、民国时期:三代祖荫下的大家庭教养 / 33        |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直系家庭中的父母教养 / 41 |    |
| 四、改革开放后:核心家庭中的祖辈隔代协理教养 / 49    |    |
| 第二章 时空穿越中的乡村学校教学 .....         | 60 |
| 一、晚清时期:作为传统儒家教育缩影的私塾 / 60      |    |
| 二、民国时期:私塾对新式学堂的僭越 / 63         |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村小的成长与辉煌 / 68   |    |
| 四、改革开放后:村小的破败与解体 / 77          |    |
| 第三章 历史变迁中的乡村社会教化 .....         | 86 |
| 一、有清一代:传统社会教化中的族长外控 / 87       |    |

|                           |       |
|---------------------------|-------|
| 二、民国时期：族长变异中的乡绅内化         | / 96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行政操控下的村官外钳 | / 102 |
| 四、改革开放后：自由共存的村民自律         | / 111 |
| <b>第四章 文化哲学视野下的乡村教育变迁</b> | 122   |
| 一、变迁的历史轨迹：传统向现代的挺进        | / 122 |
| 二、变迁的实质所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锋        | / 138 |
| 三、变迁的影响因素：内外、主客两分         | / 153 |
| <b>第五章 国家政策视域中的乡村教育发展</b> | 165   |
| 一、视角置换：乡村教育发展的“政策向度”      | / 165 |
| 二、认知基础：乡村教育发展的“中国之维”      | / 175 |
| 三、操作践行：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体两翼”      | / 191 |
| <b>结 语 麻雀的成长之道</b>        | 227   |
| 一、麻雀的演进之路                 | / 227 |
| 二、麻雀的生存之态                 | / 229 |
| 三、麻雀的成长之道                 | / 230 |
| 四、余 论                     | / 231 |
| <b>参考文献</b>               | 235   |
| <b>后 记</b>                | 241   |

## 导论

# 解剖麻雀的意义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公孙丑下》

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子系统,教育的功用早已为世界各国所认同,而在中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更为国人耳熟能详。然而,即便如此,教育研究仍有“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实践教育学”<sup>①</sup>等不同研究旨趣之分,教育研究者亦有“行政决策者、理论研究者、实践操作者”<sup>②</sup>等不同研究主体之别。因此,本研究尽管具有教育哲学的气质、教育科学的精神,尽管不乏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严谨、实践操作者的务实,但它仍是一项以实践为旨归的教育行政决策及政策研究,而其根本之处则在于以立足个案,解剖麻雀的方式,描绘百年中国乡村教育的历史变迁并对其做出理论分析,继而在此基础上,探寻某些可资当前新农村建设所用的乡村教育发展政策性建议。

### 一、为何要解剖麻雀?

任何一项研究,在其展开之初都需阐明其研究必需性,或曰“为己正

---

① [奥]沃尔夫岗·布列钦卡著,胡劲松译:《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② 周浩波:《教育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47页。

名”，而这又大致无出两端：一则，试图阐明该问题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意义重大、值得认真思考；二则，试图论证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尚需拓展、有待深入。前者概曰“研究缘由及目的意义”，后者通称“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一）研究缘由及目的

之所以要以个案方式研究当前我国乡村教育的历史变迁问题，乃因该问题本身之重要性及研究者本身之个体生活构造使然：

其一，从乡村问题本身来看。

自古以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农业及农民问题都是一个事关国家全局的基础问题、战略问题 and 安全稳定问题。<sup>①</sup>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型的泱泱大国，其在农业发展中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该问题备受重视自是不言而喻。近代以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的连年混战，给广大国人带来了深重灾难，“三农”问题更为突显，并成为思想家、政治家乃至教育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亦是情理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积贫积弱，百废待兴，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历代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和强调“三农”问题的优先地位及其全局稳定功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更是历史必然。当前，党和国家明确提出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显然也是适时之举。“三农”问题不仅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始积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也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有鉴于此，研究乡村问题实乃人类本根及中国命脉所在、大势所趋。

其二，从乡村发展的决定因素来看。

尽管乡村社会的发展受制于许多因素，如政治制度和体制、经济基础和自然环境等，但乡村发展的关键是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则主要依赖于教育。同时，作为广义的教育，它是一个集家庭、学校、社区为一体的综合

---

<sup>①</sup> 或许有人认为，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其发展重心并非“三农”问题，然而，这种认识是表象的，因为诸如欧美等发达国家之所以看似没有侧重“三农”问题，其根本原因不是该问题本身不重要，而是其农业后顾之忧已基于对其他不发达国家的盘剥而得以完全或部分的解决。事实上，任何国家都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农业或温饱问题，否则，其工业、商业及其他各业的发展都将无所适从，所不同的是上述发达国家已从别国获得了替代性的弥补而使这一问题显得暂时不成问题而已。

体,故通过教育来提高乡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高乡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村生产力,继而促进现代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已几近共识。正因如此,在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才会有诸如王拱壁、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雷沛鸿、俞庆棠等乡村教育派的产生,<sup>①</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届政府才会针对乡村教育问题进行诸如“集资办学”(1983年前后)、“分级办学,分级管理”(1985年前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及燎原计划”(1987年前后)、“科教兴国”(1994年前后)<sup>②</sup>等改革。有鉴于此,研究乡村的教育问题实乃改善乡村民生社稷发展之所需、人心所向。

其三,从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现状来看。

在如日中天的“全球化”浪潮中,在人们信誓旦旦地追逐“现代性”、不约而同且毫无介意地要与“国际接轨”时,我们却日益发现:在这个所谓的价值多元共存时代,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却过多地走向了都市化、现代化、他者化,这不仅表现在乡村教育内容的日趋反传统和现代化上,更表现在乡村教育发展目标的日渐西方化、他者化上。上述情形不仅导致国家意识和传统文化观念的日趋衰微,民族自信心、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逐渐减弱,也使我们的教育改革如失的之箭,飘萍无根。诚然,“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种动力和必然趋势、“西方”作为—种发展的客观参照物,我们无法选择和回避它们,但我们在拓展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却不可邯郸学步,从—个极端走向另—个极端,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便是此理。此间,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教育?以历史的眼光和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关注并考察乡村教育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对于综合发展乡村教育,整体提升国族现代性并确保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显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功用。有鉴于此,研究乡村教育的历史变迁问题实乃澄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和解决乡村教育发展之所需、笔者所虑。

其四,从研究者及研究个案本身来看。

笔者生于乡村,部分地长于乡村,且自1995年以来便—直从事基层乡村工作,无论作为乡村生活者还是工作者,原有的生活构造早已使自己对乡村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难以释怀的内心关注,而始于1991年的教育和其他专业的学术训练业已使笔者部分地具备了从事乡村教育研究的相关理

① 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② 李少元:《农村教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6页。

论基础,至于将湖南省道县雷洞村作为研究个案,其缘由亦与当年林翁研究《义序的宗族研究》<sup>①</sup>相仿:一则,笔者生于斯、长于斯,对该村相对熟悉,言语不会与之发生龃龉,行动亦不致与习俗冲突;二则,该村为一纯粹容姓宗族乡村,异姓杂居寥若晨星,且样本规模大小适中,可作当前我国乡村一代表;三则,该村教育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变化甚巨,且在所属县域堪称教育名村,对其教育变迁的考察颇具启发意蕴,亦有窥一斑而显全豹之效;四则,该村无论样本规模还是地域所属,作为湖南西南部的一个山村,都具有与中国其他中西部山村相仿的特征,因而也颇具研究代表性。有鉴于此,通过个案、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研究当前乡村教育的历史与发展问题,实乃笔者生活构造使然,顺理成章。

其五,从研究目的来看。

身为一名曾在乡村基层工作多年的中国公民和正在从事教育研究的学术人,对此问题的大胆探索,其任务与目的主要有四:一是想就该村有史可考以来的社会变迁及其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历程及其当下表征做一纵、横向考察和描述,以期对其有一通透了解,向国人展示当代中国乡村冰山一角的教育历史演进实况。二是通过对该村社会变迁与教育发展的“两维”(历时、共时)和“三位”(家庭教养、学校教学、社会教化)考察,向国人展示其间传统与现代的交锋过程与结果。三是以此为原型,深入探讨乡村教育发展中有传统与现代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探寻其间的变迁规律,并表明笔者自身对上述问题的一孔之见。四是在此基础上,就当下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综合构建乡村教育发展提出些许尚未成熟的良善政策建议。一言蔽之,通过解剖麻雀,以认清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演进历程及其特征,明了其间普遍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问题,继而就如何改进文化战略、完善乡村教育的文化传承机制,发挥教育应有的社会改造功能提出部分政策性建议。有鉴于此,这一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对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下的乡村教育发展问题解决都不无助益。

## (二)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之所以要研究当前我国乡村教育的历史变迁问题,乃因当前国人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深入的必要。

---

<sup>①</sup>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其一,就研究情形状而言。

首先,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主要有四:一是关于乡村社会的政治学研究。这方面可以《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乐天,1998)、《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张鸣,2008)、《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张厚安,2000)、《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徐勇,1992)、《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项继权,2002)、《基层政权:乡村制度问题》(张静,2000)、《中国农村权力结构》(郭正林,2004)、《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2001)、《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王铭铭,2004)、《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王铭铭,1997)等为代表。他们有的就我国乡村社会的某一专题如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详细分析;有的对当下我国农村的权力结构及其控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的对村级治理问题进行了专门阐发;还有的就某一具体村落的微观政治进行了个案考察。二是关于乡村社会的经济学研究。这方面可以《江村经济》(费孝通,2000)、《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1998)、《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2000)、《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民的发展(1890—1949)》(马若孟,1999)、《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毛丹,2000)、《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王玉贵、娄胜华,2006)等为代表。他们有的通过个案对整个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变迁进行了深描;有的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如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比较;还有的则从更大的视野出发,对整个新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演进历程与当下情形进行了梳理。三是关于乡村社会的历史学研究。这方面可以《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杨懋春,2001)、《祖荫下》(许烺光,2001)、《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萧公权,1960)、《张壁村》(陈志华,2002)等为代表。他们有的以某一个历史时期为时限,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面貌进行了描绘;有的以某一个村为基点,对其历史发展情形进行横截面式的解剖;还有的则对某一历史时期乡村社会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四是关于乡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这方面可以《乡土中国》(费孝通,1998)、《生育制度》(费孝通,1998)、《义序的宗族研究》(林耀华,1998)、《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林耀华,2008)、《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王铭铭,2003)、《血缘与地缘》(王晓毅,1993)、《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

(1931—1997)》(朱晓阳,200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吴毅,2002)、《林村的故事: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黄树民,2002)等为代表。上述著述主要关注乡村文化和乡村生活的整体变迁,研究文化变迁、社区控制、民间信仰、风土人情、庙宇祠堂等物质载体的存留与意义。当然,上述四类研究虽然视角不同,但在内容上却有相互交叉之处。另外,此间国外学者也对中国的乡村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可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52—1957)、《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施坚雅)、《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2006)、《中国乡村生活》(明恩溥,2006)等为代表。他们有的以抗战时期在华北农村的调查为依据,将当时中国农村发展的实况及相关资料详细汇编成册,影响深远;有的通过对成都平原村庄的研究,对人类学者从事中国基层社会研究时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有的运用自己独特的概念,从学理层面具体分析了国家政权与华北农村社会关系,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还有的则以游记形式,将自己在华北乡村社会经历中的所见、所感、所思,撰写成著,别开生面地展现了清末民初包括乡村学堂、科举制度、庙宇和宗教团体等诸多内容的华北乡村社会生活概貌。

其次,关于乡村教育的研究主要有四:一是关于乡村教育整体发展与构建的基本理论研究。这方面可以《农村教育论》(李少元,1996)、《农村教育论》(余永德,2000)、《中国农村教育焦点问题与对策研究》(李水山)、《农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赵家骥、杨东,1994)、《困惑与超越——新中国农村教育忧思录》(庞守兴,2004)等为代表,上述著作不仅对我国农村教育沿革的历史作了详细的梳理,就农村教育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而且还在总结农村教育基本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对农村教育的结构、发展模式以及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性建议。二是关于乡村教育的历史研究。这方面可以《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发展史》(苗春德,2004)、《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王雷,2003)、《定县模式与邹平模式——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之比较》(周逸先,2002)、《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黄书光,2005)、《近代华北乡村教育的变迁》(郑起东,2003)等为代表。他们有的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了近代乡村教育的历史变迁和各大人物的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的对其间不同乡村教育派别如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两大实验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有

的从学校之外的非正规教育出发,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的全貌进行了整体描绘;有的则将研究目光投向被“大历史”所遗忘的乡村社会教化,从民间的乡约、族规、家训、戏曲等领域中去探寻教化的意蕴;还有的就某一地区的乡村教育实况进行了描述与解析。三是关于乡村教育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这方面可以《中国农村教育教师发展研究》(唐松林,2005)、《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王铭铭,2004)、《政府、地方社区与乡村教师——靖远县及23县比较研究》(李建东,1996)、《唐克藏族小学教育功能研究》(赵兴民,2007)、《巴底乡齐鲁村校教育目的的个案解析》(张惠淑,2006)、《乡村教师的文化生态及乡村教育变革》(周军,2006)等为代表。他们有的聚焦当前我国乡村教师的生存及发展问题,有的着眼初等教育问题,有的关注教育目的、功能的制定及实现问题。四是关于乡村教育的人类学个案研究。这又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区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这可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马戎、龙山,1999)、《一个县教委的若干工作:嘉鱼县教委的实地调查》(张新平,1998)、《文化视野中的村落、学校和国家——一个县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904—2006)》(张济洲,2007)、《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李书磊,1999)等代表。他们有的从县域的历史、文化传统、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对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有的则集中对某一个县进行了个案专题研究,通过考察和参与县教育行政的日常生活,来寻找乡村教育管理的特点和规律。另一类是以村落为对象进行的研究。这可以《嵌入村落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司洪昌,2006)、《社会变迁中的乡村小学》(李红婷,2004)、《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空间——永宁拖支村的田野研究》(李小敏,2003)等为代表。他们有的以自己的出生地为依托,利用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研究方法,试图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中的学校变迁提供一个微观的个案景观;有的则从更小的视角出发,以某一个乡镇中心小学或村小为对象,描述和分析了学校与乡村生活的隔膜、课堂文化传承中普遍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冲突、国家的教育期望与村民教育意图的矛盾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对乡村教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便是民族教育的个案研究。这可以《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2002)、《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滕星,2001)、《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袁同凯,2004)、《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

2002)等为代表。他们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或进广西桂山深处,或入云南彝区,或与藏族同胞手舞足蹈,或同蒙古兄弟把酒言欢,对所在区域和乡村的社会乃至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形进行专门的民族志研究。此外,此间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中国乡村教育的,如丹麦学者曹诗弟(Stig Thogersen)在其《极左时期的农村教育(1957—1977):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试验的成功与失败》一文中,通过分析在山东邹平县田野调查和民间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生动地展现了20世纪山东邹平县乡村教育变迁图景,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其《1907年中国纪行》中,以游记形式和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非常突出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竞争、并存和变迁的那一幕,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其二,就研究特点及存在问题而言。

首先,研究特点。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主要有四:一是从研究趋势来看,大致经历了一个单纯研究乡村一元的封闭范式向研究乡村与国家、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开放范式转变;二是从研究内容来看,相关研究均与本学科并蒂连里,相生相随;三是从研究方式来看,不管哪类学科,无论何种视角,其研究均与田野调查休戚相关,相辅相成;四是从研究观点来看,相关研究对乡村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看法龃龉甚重、各不相同。关于乡村教育的研究主要有四:一是从研究趋势来看,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宏大叙事向范式向细微深描范式的转变;二是从研究目的来看,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理论探讨向为教育决策和实践服务的转变;三是从研究内容来看,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研究教育系统内部向教育与社会其他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系统交相互动的转变;四是从研究地域来看,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院校向非少数民族地区、非少数民族院校的转变。

其次,存在问题。从整体态势来看:一是对此问题的研究及著述不多,大有被忽视之嫌。客观地说,除20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出于改造和拯救日益破产的中国乡村现实需要而发起的“乡村运动”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此间关于乡村社会及教育问题的研究基本呈中断状态。即便到了90年代,尽管乡村社会成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热点,国人也逐渐开始意识到研究乡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意义,并发出诸如“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秘密、密码、内核和本质都深藏在即将成为废墟的乡村之中”<sup>①</sup>、“乡

① 王学典:《发掘农村:21世纪中国历史的增长点》,《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sup>①</sup>的疾呼，但终也难以聚众成势。二是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心存余悸、颇有曲误。对那些提倡国家意识、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乡村本土化之人，人们要么视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要么干脆扣上一顶“否定改革开放”的帽子；对那些致力于农村和农村教育研究的人，人们要么诬其顺势而动、沽名钓誉，要么蔑其与当局合谋、犬随政治；而对那些致力于乡村教育田野研究之人，则要么斥之视角褊狭难具代表性，要么驳之方法落后难有解释力。从具体研究来看：一是上述两类研究基本是一种分离式的研究。如若不是自然的交叉，二者按照自身既定的方向和路径各行其是，几乎不会认真思考其与对方的关系问题，也不会强烈地意识到乡村社会与大教育联系之必然性所在，并将二者人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值得肯定的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派在这两方面的结合是相对出色的），继而，尽管两者的纵深研究颇具成果，但却对解决现实乡村教育的具体问题助益不大。二是上述两类研究本身亦存在诸多问题。在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乡村是否是一个天然的研究单位、乡村研究的侧重点是乡村系统之内还是之外等问题仍存争论。如在关于乡村是否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一问题上，美国的施坚雅（Schanyah）就认为中国基层的单位不是村庄，而是集镇；而日本对此也有两派，一派如清水胜光、平野义太郎等认为中国存在乡土共同体，中国农村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而另一派如戒能孝通、福武直等则认为中国不存在明确的地界性，村民关系松散，仅是结社性质而无共同体性质。又如在研究乡村社会的视角上，有的侧重微观视角，如黄宗智就将村落视为一个自足性的单位，重视研究其内部的微观关系，而施坚雅却主张应侧重村落社会与外部的联系，<sup>②</sup>上述争论足显其间分歧不小。而在乡村教育的研究中，已有研究也存类似不足：一则，国人对乡村教育的研究过于侧重于教育系统内部因素的考察，而忽视了教育与乡村社会其他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继而使研究只局限于教育系统内部之内而有井蛙之嫌；二则，过于侧重于乡村教育静态、横向的描述而忽视动态、纵向的历史变迁考察，继而使研究只限于现象堆积或事实罗列而显枯燥有余、生气不足；三则，

① 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转引自司洪昌：《嵌入村落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华东师大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3—25页。

过于侧重于个案本身分析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由此得出更具通约性或解释力的结论的展示,继而使研究相对停留在提供事实或讲述故事而显枝繁叶茂却深度不足。

其三,就本研究而言。

诚然,在认识上述研究存在问题或不足的同时,并不必然表明本研究就定能做到上述的完美结合,特别是田野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固有缺陷及国人对田野研究的固有偏见更使笔者此项研究难逃上述研究存在不足之窠臼。毕竟,一个村的教育历史演进历程及其特征难以完全说明方圆 960 万平方千米的中国乡村情形,单凭一个村的个案考察就对全国性的乡村教育变迁发展予以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构建,实也难以服众。但无论怎样,本研究立足一个村的教育变迁,以历史回溯的方式,再现其时教育面貌,并将这一历史变迁过程纳入传统与现代这一维度的考察,除能获取田野研究所带来的部分故事之外,想必亦能在理论与实践上获取部分足资新农村建设特别是新农村教育建设参考的东西来。倘若将上述“工作”亦视为有创造性的因素或一丝贡献,纵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笔者亦可从中自得其乐了。

## 二、如何解剖麻雀?

乡村教育及其变迁问题如此重要,相关研究亦需纵深推进,那么,笔者将如何开展本项个案研究?显然,这便关涉到相关概念的厘定、研究思路的廓清、研究方法的撷取、行文结构的框定等具体问题。

### (一) 概念说明

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有必要对本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概念“乡村”、“教育”和“传统与现代”做出相关说明。

其一,“乡村”观。

当前关于乡村概念的界定问题,目前我国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将其视为一个与城市相对的农村地域,另一种则将其视为一个在行政区划意义上与县市、乡镇相区分的农村地域。其实,无论以哪种方式,两者论争的关键是集镇和县属不属于乡村。对此,人们存有“集镇应归于农村”、“集镇应属于城市范畴”和“县属于农村”、“县不属于农村”等不同

看法。<sup>①</sup> 鉴于上述分歧,笔者特对本文使用的“乡村”做出如下说明:首先,本文的“乡村”,就其通常用法而言,可与“农村”同义,因为就其地域来看,我们确实很难在二者间做出明确划分,并且就其惯常用法来看,人们也常将二者通用,如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称为“乡土中国”,<sup>②</sup>杨懋春先生将“农村社会”视为“乡村社区”<sup>③</sup>等。其次,本文的“乡村”,就其管理地域而言,是一个包括村和乡镇在内的行政管理区域,不包括县。因为现在许多农村已形成了以集镇为中心,包括周围乡村在内的一种新的乡镇社会模式,集镇不仅是乡村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乡村文化、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开发中心,集镇对广大农村地区有着巨大的辐射功能,且集镇和农村的情形相差不大,但县镇和农村却有很大差别,其经济、文化、政治、教育乃至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等都已和城市非常接近,故本研究不将其作为乡村之列。再次,本文的“乡村”,就其功能而言,其辐射面会涉及到县级相关内容。因为“从历史上看,在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与治乱循环中,中国的县制基本保持稳定,长期担负着农村基层政权的职能,它是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保持联系的结合部和政治枢纽”<sup>④</sup>,乡村教育的发展无疑要受到县乃至国家层面的强烈影响。

## 其二,“教育”论。

虽然,关于教育的起源及本质的争论,在我国教育学术界一直众口不一,在教育概念的界定上亦分歧不小,但都赞同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如“教育是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sup>⑤</sup>，“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sup>⑥</sup>等;后者如“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以影响入学者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sup>⑦</sup>，“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他们发生

① 转引自唐松林:《中国农村教师发展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计划生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

④ 于鸣超:《现代国家制度下的中国县制改革》,《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⑤ 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⑥ 袁振国:《当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⑦ 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某种变化的活动”<sup>①</sup>等。据此,人们将教育活动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校教育,另一类是非学校教育,后者包括家庭教育、校外教育机构的教育、各种社会组织中的教育、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教育四种。”<sup>②</sup>有基于此,特对本研究所使用的“教育”做如下说明:首先,本研究所择取的教育是广义的教育概念,包括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非学校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村落教育。其次,本研究所择取的教育活动中,其考察要素分别对应为:家庭教育中的教育者为家长,受教育者是子女,教育活动以家长的言传身教、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等方式进行;学校教育中的教育者为教师,受教育者是学生,教育活动以既定的显性课程和潜在的隐性课程等方式进行;村落教育的教育者为家族或村官,受教育者是族人或村民,教育活动以家族或村官有意识地控制族人或村民思想,主导村落舆论、规范族人或村民行为等方式进行。

其三,传统、现代、教育三方“关系”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即文化传统,就本质而言,“它是人类某种文化精神经过多次重复、再现凝止而成的结构——功能组织”<sup>③</sup>,按照希尔斯(Adward A. Shils)的观点,“相对固定成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代代相传经过三代以后就可以称之为传统”<sup>④</sup>。本研究的传统主要指中国传统文化,即自先秦至五四以来历史地形成的、为中国人所特有的文化精神及基此的知识系统(语言文字、知识观念)、价值系统(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行为系统(行为规范、风俗习惯)总和。现代或现代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人们通常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来理解其含义。前者指人们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一种价值确认,即认为它是优于“过去”的一种“当下”状态,是承传统和启未来之间的一个纽带;后者则特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于工业化、科学化、技术化、理性化、都市化、世俗化、工具主义等尊崇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本文主要指后者,即“指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后来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sup>⑤</sup>,其宗旨是用理性代替神性、以科学知识取代神话和幻想,其基本内涵是一种世俗化

① 袁振国:《当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 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③ 杨善民、韩锋:《文化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④ [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4—17页。

⑤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